

萨满：鄂伦春先民的智者

鄂伦春民俗学者关小云访谈录

唐李文/摄



2006年在加拿大关小云与印安商在一起

唐：《鄂伦春族萨满文化遗存调查》这部书，收集了很多实地调查整理的口述资料，很感性地记录了宗教文化残余的部分，较为客观地呈现了萨满这一神秘的文化现象。给我们谈谈你对萨满文化的研究过程，书是如何写成的。

关：小的时候看到过萨满跳神，不懂，感觉很害怕。大一点后，跳神就被禁止了。和其他解放后成长起来的鄂伦春人一样，只知道萨满是很神秘的，山上生活的长辈们常会说起这些。

真正接触萨满文化还是在1990年，吉林社科院的富育光，还有另一个民俗学者王宏刚，他们一行来到十八站，搞鄂伦春萨满调查研究。那时我在十八站当副乡长。我接待了他们，我陪他们去采访过去的萨满孟金福，那时孟还健在。此外，还采访了10多个老人，孟永尼、关扣尼等，过去也都是萨满。这期间，调查组在呼玛河大桥，让孟金福和关扣尼等，现场表演了萨满祭祀仪式。他们把这个仪式的录像带到了匈牙利举办的国际萨满教研讨会。

从这以后，我就意识到鄂伦春的萨满文化是有很大影响的。1991年世界萨满教研讨会在长春举办，他们也请我去了。在那儿我接触到世界各国研究萨满教的专家。从这时起，开始收集研究有关萨满的资料书籍。我在工作期间，抽时间继续萨满调查，那时村里的老人们都健在。1993年我出版了小册子《鄂伦春民俗概览》。这本书有不少调查的成果，比如，王肯先生（《鄂伦春族小唱》的词作者）1956年把萨满神服用图画下来，可是各个部位都叫什么名称有什么寓意却并不清楚。这本书出版，给我以很大的鼓舞，我开始抽出更多的时间做这方面的调查，听老人们讲故事，讲有关萨满的经历，讲神像、神偶、各种萨满仪式、神曲等等，资料越集越多，很多有关萨满的现象也越来越清晰起来。这期间，我接待了更多的来这里调研的民俗研究者，还参与了拍摄鄂伦春传统狩猎生活的影视剧等。1998年，我的《鄂伦春族萨满教调查》水到渠成变成了一本厚厚的书。1999年，日本第一书房将这本书全文翻译出了日文版。

唐：提到萨满，人们想到的往往是跳大神，并简单地归类于一种迷信活动。这种流行的看法，其实包含着很多误解和偏见，可以说是一种“没文化”。它忽略了萨满存在的具体背景，意识不到萨满在那种特定的原始生存境遇中的真实意义，单就一种呈现在生活中的文化“幽灵”，来概括一种古老的生存性的观念体系。另外，即使人们所说的跳大神，其作用也还有待

认识，比如它与现代西方精神病医学的关系，与许多精神疗法的相近等等。

关：解放前，鄂伦春一直在森林中过着原始的游猎生活，这样原始的生存方式，在世界其它地区也存在。在中国的历史上古代北方民族肃慎、挹娄以降的阿尔泰语系的诸民族都信奉萨满教或保留了某些萨满教遗俗。萨满教因“萨满”而得名。萨满，在以往的学术界多解释为“因兴奋而狂舞的人”，这种解释并不接近其词源古意，也没有道出萨满的主要特征与基本内涵。今天，我国北方通古斯语族的满、赫哲、锡伯、鄂温克、鄂伦春等五个民族称“萨满”仍沿用这个通古斯古意，其意为“知晓”、“晓悟”，即能晓悟神意的人，是神灵的使者，人类的代表，人神的中介。

萨满和鄂伦春的氏族族，在生产生活中都是重要角色，生活中的大事小情，解决什么问题，下一步氏族中有什么重大活动，都要问卜于萨满。但萨满又常常是一个普通的人，在生活中并没有多大特权。用现代的说法，萨满其实就是生活中的智者。在举行神事时，他是人与神的中介。过去，人们不知道天为什么要打雷刮风，自然现象他不理解，就认为是神或萨满在起作用。打猎打不着，他就求助山神，有病有灾，那时没有医生，他就通过萨满，请神送神，消除疾病。

唐：萨满作为“智者”赢得人们信任，据说，还因为他们比一般人懂得更多的知识。比如对中草药的知识。

关：外国学者米·埃利亚德说过这样的话：“萨满不只是神秘主义者，萨满确实可以称得上是部族传统经验知识的创造者和保护者。他是原始社会的圣人，甚至可以说是诗人。”

唐：你在“调查”一书中，实录了一些萨满的口述经历。你在后来的调查研究过程中，接触过类似的跳神治病的事吗？

关：1995年时，关扣尼（原萨满，现为萨满舞传承人）病了，她在十八站医院住了两年，病很重。她姐姐关扣杰来找我，说扣杰叔（关扣尼的鄂族名）的神来了，要鸡血。我去市场买了个活鸡，还有酒和贡品。孟金福（原萨满）大爷把神衣、神鼓都准备好了，活鸡供在神位前。先是孟金福萨满穿上神衣，给她跳神。后来关扣尼在姐姐的帮助下也穿上神衣，坐着请神，慢慢站起来，接着跳起来，由慢到快，随着神歌和鼓声舞动，疯狂地跳。之前，她连走路都困难，现在穿着那么重的萨满服，随着鼓声的节奏，蹦蹦跳跳，舞步旋转，把我惊呆了。突然，她“咚当”倒下了，一动不动。我吓得够呛。好长时间，她才缓过来。坐起来抽了一支烟，站起来，脱下神衣，开始又说又笑，好像什么也没发生似的。我们一起吃了供品，吃鸡肉，喝鸡汤，高高兴兴地说笑。

第二天早上，她就出院回家了。

唐：类似跳神治病的奇事也听过不少，可是，为什么很多人有病了，跳神就跳不好呢？我读过列维·施特劳斯的一部书，对此有细密的举证分析。他认为在原始社会里，人在精神或神经方面的疾患，远远超过文明社会，因为他们生命中有太多的偶然，生存就像漂浮的泡沫，随时都面临死亡，自己并不知道原因。他们在心理、生理上的反射与文明人是不一样的。萨满的跳神，在这样的构成里就成了有所依托的暗示，并不是无所指的神秘。

关：随着1952年鄂伦春萨满告别神坛，狭义的萨满活动逐渐在生活中淡却了，但作为文明源头的鄂伦春萨满文化，却依然发生着影响。比如源于萨满文化信仰的对火神的崇拜，如今就演化为鄂伦春人一年一度的篝火节。其它的，如呈现在舞台上的斗熊舞、神曲、萨满服饰、萨满神舞等等，无不源于萨满文化。它们是现代文明最具活力的补充性因素。现在国家已经充分意识到了非遗传承在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塑造中的作用。关扣尼萨满现在是这个地区仅存的一个萨满，人们称她为“最后的一个萨满”，她已被命名为萨满舞的传承人。这些年来，她参与了众多有关萨满仪式重现的拍摄活动，留下了许多电影和录像镜头，为萨满文化溯源提供了第一手的研究资料。此外，其它的一些如鄂伦春的剪纸、刺绣等非遗传承，也无不烙着萨满文化的印迹。

唐：你在书中记述的老萨满，现在还活着的只有关扣尼一个人了，人们称她为“最后的萨满”。那么，过去当萨满需要什么条件呢？

关：从现有的资料上归纳，一般来说有四种方式。一种是老萨满用神验的方式来选择接班人。老萨满年迈想找接替人，便把族中的男女青年聚于一室，男坐南边，女坐北边。老萨满焚香在两炕中间摇晃，一时香烟弥漫，谁被烟熏发抖，乃至昏晕，老萨满便选定他当接班人。第二种是已故萨满“抓”的。某一姓氏老萨满谢世，氏族中没有能主持大祭的萨满，俗称“扣了香”的，过若干年，族中有人久病不愈，突然外出，或去高山，或去大江，过了一段时间回来便神志清醒，并有当萨满的愿望，便被认为是成了神的萨满抓的。第三种是孩童得了重病，经许愿病愈后当萨满侍候神祖，如孩童病愈，便可随老萨满而去，学萨满。关扣尼就是这样成为萨满的。第四种是由族人推选。一般都推选几个品貌端正、口齿伶俐、聪慧好学的青年跟本姓萨满学，学习优秀者，并通过了考验，如“奥云”（指萨满旋天术）等，并通过“抬神”仪式，方能成为氏族公认的神职萨满。各民族萨满传承都有具体的方式。鄂伦春多是第三种方式，是一种接近原始形态的方式。

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一份报告：目前世界上每分钟有1种植物灭绝，每天有1种动物灭绝，这种远远高于自然的“本底灭绝”速率上千倍的局面是有关地球生命生存状况与质量的严峻警告！我认为这种说法绝非危言耸听。早些年，在乌苏里江畔的莽原和完达山余脉的林间，经常会见到三五成群，几十只成群的乌鸡这种鸟类，如今人们再也难觅其踪了。短短几十年间，森林里这种生性好斗的乌鸡人们已经无缘见到，只能成为山里人美好的记忆。

饶河县陈德新老人回忆，十一岁那年，即上世纪四十年代后期，他住在挠力河北一个叫四平山的小屯里。秋天割庄稼时按双目失明的外祖父指教的方法，在离家约百十米的大地里扎过一个专门捕捉乌鸡的“乌鸡窝”。

这东西很简单，在收割完庄稼的地里先挖一个直径约一米多的环形沟，然后将高粱秸埋堆沟内。在一米高左右的地方，内外用几根高粱秸横架捆扎牢固，约一人高即可。多余部分用镰刀削去，然后在扎蓬上插些苦房草，让草向内倾斜，这样窝子上面就巧妙地地被草遮蔽住了。在圆形窝子中心插一个高出苇箔的棍子，棍子上端绑两棵高粱穗和玉米穗，乌鸡窝便大功告成。

当他们忙着扎窝子的时候，不时见有乌鸡从头顶飞过，不知它们是来侦查打探的，还是急着要往窝子里钻？看到这情景就更促使他们尽快地将窝子搭建好。天近傍晚，他和哥哥连饭也顾不上吃，就躲在房后山围墙的缺口处静观四面八方向窝子飞来的乌鸡，不管来的是大群还是小群竟然可以一个不剩的落入窝内，有时来了一、二十个的大群，上面的空中抖落着翅膀，等待着下面的伙伴纷纷落进去后，腾出位子它们再当仁不让地紧随其后落进去，全然不知这是人类为其设下的陷阱。

就在此时，林子过来一辆三马挂着铃铛的花轱辘车，还跟了三只狗。这狗老远就察觉出了异常直奔窝子而去，待他们回过神来狗已经钻进窝子里了。哥俩跑近窝子时，乌鸡像放鸽子一般，从窝里惊飞出来，有些似飞似跑的在地上翻滚奔逃。乌鸡窝早已被狗钻出一个大窟窿，只见窝里翻滚着许多乌鸡，多数是由于半空中坠落下来时相互踩踏造成，大都半死半活了，窝子外面有些还在滚爬。他和哥哥将狗驱赶后，拿着麻袋少说也捡了三二十多只战利品，哥俩费劲巴力地用麻袋往家拽了两趟。此后的若干年，陈德新老人再没有见到这么多的乌鸡。

据1984年出版的《长白山西南坡野生经济动物志》记载，乌鸡学名为黑琴鸡，黑琴鸡属中等体型的鸟类，雄鸡体长与家鸡差不多，重约1600克，雌鸡的体型比雄鸡略轻些，与雌野鸡的样子颇为相像。雄鸡和雌鸡差异非常明显，雄鸡全身羽毛呈黑色，并闪着蓝绿色金属光泽，尤其是颈部更为明亮。翅膀上有一个白色的斑块，称为羽镜。别致的

消逝的乌鸡

王爱平



是它的18枚黑褐色的尾羽，最外侧的三对特别延长并呈镰刀状向外弯曲，与西洋古琴的形状十分相似，所以得到黑琴鸡的美称。

黑琴鸡特别喜欢在落叶松林、樟子松林及其他阔叶林组成的混交林中活动。它们常成群活动，每群由几只，几十只，甚至上百只组成，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有学者考证曾在乌苏里江地区发现百只以上的大群。

黑琴鸡善跑，飞行时呈直线，但飞行距离相对较短。乌鸡天生犯傻，警觉性难以令人恭维。当它栖息在树上时人走到树下也不飞走，这就难免要遭致黑手了。而野鸡的警惕距离远在三四十米之外，不待人近前早逃之夭夭了，这也是野鸡至今得以繁衍生息的重要因素。黑琴鸡夏季在巢区附近的僻静处活动，有时也到树上，故民间有“乌鸡上树”之说。雌乌在孵化时很恋巢，人走到跟前也不出窝，甚至和人格斗，直至把人逐去才算罢休。早年心怀巨测的山人就采用网罩捕捉的方法连卵一窝端了。黑琴鸡善于鸣叫，雄鸡能颤动整个身体，发出一连串类似于吹水泡和拉风箱的美妙歌声。

黑琴鸡的食物主要源自各种乔、灌木的嫩枝、嫩芽、浆果、花和种子，像桦树、柳树、杨树、忍冬、草莓、刺玫、蒲公英、草籽等，同时也吃一些昆虫和蚂蚁卵等多种动物性食物。

漫长的冬季来临，大雪封山，气温在零下三四十度，黑琴鸡仍游荡在河畔和山谷之间。它们黑色的羽毛能大量地吸收太阳的光热，增加御寒能力。平时它们很少活动，只在下午二、三时阳光充足时到食物丰盛的山谷地带觅食。黄昏时便飞在雪地上用爪子扒出一个可以容身的雪窝，挡住凛冽的寒风。这也是它们对恶劣环境的绝妙适应。

但就是这种奇特无比的黑琴鸡，仅几十年间就在我省东部地区销声匿迹了。据我们在黑琴鸡栖息地乌苏里江畔、完达山余脉考察，八十年代初，虎林广播站的尹君先生在阿伦河一带架设广播线路时，曾在野外的树上发现过两三只乌鸡，他惊喜地呼喊着“乌鸡上树”，许多同事都看到了。同一时期，曾有人目击在虎头镇月牙村的北甸子里，一位猎手拿猎枪从树上打下两只乌鸡，那时猎枪尚未被收缴。虎头镇独木河村的村民则向我讲述了好多有关乌鸡的故事：八十年代中期，这个靠山的村子周围频频有乌鸡出没，一次，在甸子里割草时惊起一只乌鸡“咕噜噜”地飞到了林边的树上，他们就悄悄攀上树去，趁其不备竟用镰刀将乌鸡打下树来。若使用猎枪的话犹如探囊取物一般，因为乌鸡这种鸟实在太傻了！

以放山为生的周辉成老人说：早年听老辈人讲曾在庄稼收割后的田边地头扎过“乌鸡窝”（音音读卷），这个乌鸡窝与前面提到的“乌鸡窝”有异曲同工之处。即在田间打上简单的木桩，用柳条或荆条当杈子，夹一个曲折迂回的过道能容乌鸡进去，窝里稍宽敞处撒些玉米棒子、谷穗、高粱穗为诱饵，乌鸡寻着诱饵一旦钻进这个迷魂阵，吃饱喝足后就再也难以找到归路，只能焦急地在窝里转来转去，期望能从杈子空隙钻出去。由于乌鸡体型偏大过于笨拙，不会像其它鸟类垂直起飞，即便飞进这个圈（音音）露天敞开着，乌鸡也难以逃脱罗网，最终成为山里人餐桌上的美食。

1989年10月1日，我国颁布了首部《野生动物保护法》，黑琴鸡被列为国家二级保护鸟类，遗憾的是此时乌鸡已在黑龙江东部地区消失不见了。

完达山一带乌鸡的消逝给人类再次敲响了警钟。人类过度滥猎无疑导致了这种鸟类在东部地区的消失。值得欣慰的是，目前我国大兴安岭地区的黑琴鸡幸存了下来，其种群密度每公顷虽然仅有0.00035只，但毕竟得到了当地政府的有效保护。

北国风



扫描二维码
关注北国风

古道抗联情

刘城

每年五一小长假，我都会从工作的黑河回故乡嫩江，往来一回走黑嫩公路。黑嫩公路是一条古驿道。据史书记载，从元代开始，它一直是联系边疆和内地的纽带，尤其是清初在驿道设置驿站，为抗击沙俄入侵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就散落老站、二站、三站、四站这些镌刻着历史痕迹的印记，在驿站居住三百多年站上是这片土地的开发者和建设者。

这个季节是站上人春整地和播小麦的时候。春天就是播种的季节，就是希望，只不过现在是农机合作社，是现代化的大马力机械作业。然而在七十多年前，站上人支持抗战战士打击日本侵略者，在这条古驿道上留下了他们的英雄事迹和壮丽诗行。

车行大岭后，我想起了陈雷回忆录《征途岁月》中记载的一段站上人支援抗联部队的往事。当年，在大岭至塔溪中间有石头里湾子、十五里湾子、十八里湾子、二十里湾子等小屯，其中十五里湾子屯是第一个掩护抗联部队的地方。大约是1938年2月份，春节前夕，东北抗联西北临时指挥部组织部队北上，由原抗联3军3师师长张光迪任一支队支队长，陈雷负责政治工作。其任务就是选择北满省委及抗联第三路军指挥部的“落脚点”，即根据地。但一支队在塔溪境内的松木山（即松木砬子）被日伪军包围，损失惨重。激战中，支队长张光迪负伤。朝鲜族机枪射手安英同志为了掩护部队撤退牺牲，陈雷后曾写诗纪念，《松门山》写道：“翘首松门雪海风，远来游击嫩江东。黎明鏖战硝烟舞，银岭驱倭仗剑锋。消灭贼奴心与共，争存鲜汉志相同。安君热血洒荒野，朵朵烟花火样红。”

部队突围以后，一支队继续北进，在十五里湾子屯受到热情接待。十五里湾子屯群众是站上人后代，他们热情好客，尤其知道这支队伍是抗联部队后，杀猪杀鸡招待这些被日伪军追击的战士。吃过饭后，为了不給百姓添麻烦，战士们都在院子里的草堆里休息，陈雷居住的那户老大娘坚持不肯让他们在外面过夜，连拉带拽把他们让到了屋里炕上，和大家一直唠到深夜，第二天依依惜别。在十五里湾子屯的寒冬夜晚难忘，陈雷写下了《进驻十五里湾前后》诗：“雪光朝映兮眼难张，朔风狂作兮足彷徨。空山寂寂兮人声渺，忽得雪径兮指茫茫。跨重山兮步履轻，夕阳将下兮急行。十五里湾兮犬吠，站上人见兮目惊。农家主妇兮胆识勇，殷切问兮慰英豪，战士厮声兮出灶侧，老妪怜兮内心焦。一觉醒来兮东方白，谢主人兮动情怀。相知心兮如日月，约凯旋兮再归来。”

一支队随后北撤到商家屯、杨树屯一带，同样受到当地站上人的热情接待。当时，部队突围时战马损失殆尽，无坐骑可乘，日伪军又出动侦察飞机，追兵很快就会到达商家屯等地。激战中张光迪等人负伤，只能快速离开嫩江，甩开日伪军的追击。商家屯等几个村屯为部队筹粮，选派几辆马爬犁，沿小道雪地拉荒二三百里地，送到黑龙江畔，由上马场撤到了苏联境内。据嫩江学者王国华考证，这个过程是嫩江县直接掩护抗联建制部队的第一次，也是最大的一次，最冒险的一次。

车行过四站塔溪、沐河、石头沟子这些老村屯后，便到了五站科洛，科洛现为镇政府所在地，因科洛河得名。目前，科洛河上正在修建第二座新的大桥，一派繁忙景象。在戎马倥偬的抗联年代，蜿蜒流淌的科洛河留下了陈雷的诗句，《科洛河上遇战友》写道：“进军朝阳旅春华，草木峥嵘阅军家。隔河相逢恨恨短，中流共筏笑语哗。漫览江葱翠两岸，时摘野菜选新芽。科勒源头当饮马，且随流水去天涯。”从诗中可以看出，描写的是江葱两岸、野菜发芽的初春时节，当时抗战战士们精神抖擞、以苦为乐、斗志昂扬。

七十多年光阴荏苒，如今，古驿道已建成了高等级的白色路面，十五里湾子等小屯也早已撤并，无迹可寻。然而，站上人支援抗联的鱼水深情、抗联战士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那些征战中的诗句却一直在古驿道传颂，时刻让人铭记那段难忘的征途岁月。



乌拉楞里的萨满

那个年代买煤闹心事

王学民

推车……”老伴一听说：“这花钱买煤，该有多难啊！”

很快就要到年关了。一天，我和老伴从亲属那儿借来手推车，冒着刺骨的寒风，头发都成了白霜，气喘吁吁地到达了营业部。只见一名营业员，从窗口探出脑袋，大声喊：“没有煤了。”这算是一个不错的交代，有时一天也不开门，也不出来吱一声，许多人白白的排队，一整夜的守候，带着星光来，伴着星光走在归家路。

没有买到煤，心如刀绞，焦急万分。我和老伴商量，明日得早起去排队，捞个好号头。于是这一天半夜起来，我推着手推车，她在后边紧随，我俩在漆黑的深夜，夜深一脚浅一脚，走有半个小时到了营业部。天快亮了，我排中间，前面有七八个人，这时老伴和我说：“我在这排队，你去看有没有煤，啥质量，然后再决定。到那一看，煤的质量较好，去买煤人员很多，都抢占煤堆，这时煤堆已抢光了，无奈回家了。到家后老伴问我：“怎么没有买回煤呢？”我看了看她说：“买煤的人比煤还多，再去买煤得多去人，一人抢占煤堆，一人开票交钱，还得带着手



“汇报”，她想了想便说：“煤质量差些，就差些吧，买吧……”不然我们俩起五更爬半夜来，挨冷受冻不就白遭罪了。”就这样买了200斤大头煤，我推着手推车，老伴拉外套，我俩弄得手指发黑，脸上都挂一层黑灰，一路上风尘仆仆急奔家中。

想起昔日买煤那件闹心事，让人有些心酸，现如今我的家乡也发生深刻的变化。从烧柴火到烧煤，烧煤再到烧气，再到取暖集中供热，真让人感慨万千。